



胡彬彬 吳燦 著

河南大學出版社

長江流域民俗文化與藝術遺存

道風遺韻

道
教
造
像



道
教
造
像

道風遺韻

長江流域民俗文化與藝術遺存

胡彬彬 吳燦 著

湖南大學出版社



内容简介

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长江流域民俗文化与艺术遗存”丛书之一。

本书以唐以降至清末长江流域地区的道教造像作为研究对象，并将其置于我国唐、宋、元、明、清各代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之下，对长江流域不同区域间的多元民族文化交融下的中国道教造像艺术，做出较为全面系统的梳理，并对道教造像程式与仪轨、造型与风格、材料与工艺等方面做出重点的研究与论述。书中列出的200多幅道教造像实物图片均系作者20多年田野考察的珍贵资料。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道风遗韵 / 胡彬彬, 吴灿著. —长沙: 湖南大学出版社, 2013.7

(长江流域民俗文化与艺术遗存)

ISBN 978-7-5667-0369-9

I. ①道... II. ①胡... ②吴... III. ①长江流域—道教—造像—唐代—清代—图集

IV. ①K879.3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42722号

长江流域民俗文化与艺术遗存

CHANGJIANG LIUYU MINSU WENHUA YU YISHU YICUN

道风遗韵

DAOFENG YIYUN

作者: 胡彬彬 吴灿 著

文字编辑: 祝世英

责任编辑: 李由

责任校对: 全健

责任印制: 陈燕

出版发行: 湖南大学出版社

社址: 湖南·长沙·岳麓山 邮编: 410082

电话: 0731-88822559(发行部), 88649149(编辑室), 88821006(出版部)

传真: 0731-88649312(发行部), 88822264(总编室)

电子邮箱: liyou0731@126.com

网址: <http://www.hnupress.com>

印装: 湖南天闻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89×1194 16开 印张: 15.75

字数: 341千

版次: 2013年7月第1版 印次: 2013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 000册

书号: ISBN 978-7-5667-0369-9/K·73

定价: 148.00元

總序

胡彬彬

文明是指人類所創造的財富之總和，包括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文明與文化既有區別又有聯繫。文明是文化的一種實踐成果，是文化的物質及精神方面的表現，可以影響文化的改變；文化是一種觀念，是文明的基礎，可以決定文明的命運。并非所有的文化都能結出文明之果，但任何一種文明，都以與其相稱的文化為基礎。文化的變遷對文明的產生有很大的作用。

任何一個文明的興起壯大，都離不開水的滋養。例如，恒河滋養了印度文明，尼羅河滋養了埃及文明，底格里斯河和幼發拉底河滋養了小亞細亞文明，愛琴海滋養了希臘文明。中華文明也是如此。有學者指出：『中國文明起源的問題，從某種意義上也可以說是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文明的起源問題。祇要對黃河、長江兩河流域文明的進程有個基本的了解，中國文明起源的問題就基本解決了。』^①由於諸多歷史原因，相當長的歷史時期以來，史學界都曾達成一種偏見共識，認為祇有黃河滋養了中華文明。但是隨着越來越多的考古證據的出現，長江文明作為中華文明的另一源頭，也越

來越得到廣泛認可。^②季羨林先生總結說：『楚文化或者南方文化至少可以同中原文化并駕齊驅。』^③甚至在很多方面，長江文明都要早於黃河文明。長江文明區域之廣，文化遺址數量之多、密度之大，出土文物之多，都堪稱世界之最。特別是長江文明中的『稻作文明』，給東亞及世界以很大影響。當然，我們也不是要將長江流域上昇到中華文明的第一發祥地，而是要說明中華文明的多元性、兼容性和統一性，『研究長江文化正是爲了向世界展示中華文明的這一特點』。^④

這條世界長度位居第三的大河，發源於青藏高原的唐古拉山脉各拉丹冬峰西南側，全長六千三百餘公里。幹流流經青海、西藏、四川、雲南、重慶、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蘇、上海十一個省級行政區域，於崇明島以東注入東海，自西而東，如一條巨龍蜿蜒曲折，奔騰於中國中部地區。數百條支流輻輳南北，延伸至貴州、甘肅、陝西、河南、廣西、廣東、浙江、福建八個

① 李伯謙：《長江流域文明的進程》，《考古與文物》，1997年4期。

② 范小平：《對長江文明的重新估價》，《中華文化論壇》，2003年第1期，第35-39頁；邱述學：《重構長江文明》，《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2008年第3期，第90-98頁。

③ 季羨林：《中國古史應當重寫》，《群言》，1993年第6期。

④ 葉書宗、馬洪林、朱敏彥：《長江文化與中華民族》，上海書店出版社，1996年，第5頁。

省區。長江流域以其獨特的地貌和廣闊的面積，蘊藏着豐富的自然資源。豐富的自然資源，又為文明的誕生和演變創造了條件。

早在舊石器時代，中華民族的祖先就在長江流域這片地理環境優越的土地上生息勞作。考古學家們已經在這條大河流經的區域發現了大量中華民族「童年」的遺迹。在長江上游地區的雲南的元謀，發現了距今已有一百七十萬年歷史的元謀人化石，這是迄今為止中國發現最早的屬於猿人階段的人類化石。此外，雲南麗江、四川資陽、湖北長陽，都出土了大量的早期人類化石和他們所使用的石器。這些距今都有十幾萬年至一萬多年了。

目前被學界所認可的長江流域史前文明，大致包括如下幾個地區：環太湖地區，主要由馬家浜文化（有羅家角遺址、馬家浜遺址、圩墩新石器遺址、常州果園遺址等）、崧澤文化（有崧澤遺址）、良渚文化（有良渚遺址、三皇廟村寺墩遺址）等組成；浙江地區，主要是河姆渡文化（有河姆渡遺址、田螺山遺址）；江西地區，有吳城遺址；湖南地區，有炭河里遺址、彭頭山文化、玉蟾岩遺址；湖北地區，有屈家嶺文化、石家河文化；四川地區，有大溪文化。

長江流域地區進入農耕文明階段的時間非常早，而且相當成熟。在世界其他地方包括黃河流域，還沒有發現過類似的早於長江流域的文明。這充分突顯了長江流域在人類文明進展過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夏商周時期，長江文明進入了一個新的高度，並成長為幾種主要類型，包括三星堆文明、吳文化、越文化、楚文化等。文化總是在不斷的交流碰撞中成長，文明也隨之進步。早在三星堆出土的文物中，就留下了蜀地與中原相互交流的迹象。這就充分表明，沒有任何一個文明是封閉成長的。此外，吳文化是中原的商

周文化和吳地本土文化相融合發展的產物，越文化是中原的商周文化和越地本土文化相融合發展的產物，楚文化是中原的商周文化和楚地本土文化相融合發展的產物。

秦王朝統一中國之後，中華文明進入了一個大的融合期。長江流域早期的各種地域性文化，逐漸向外傳播，進而影響到整個中國文化。與之相應的，其他的文化也通過各種途徑影響着長江文明。長江文明與黃河文明等中國各古代文明長期相互影響融合，成爲中華文明。不過，由於悠久的歷史，長江文明還是打上了深刻的地域烙印，始終保持着自身鮮明的特色。

國家形態的建立祇是文明社會的抽象概括，其載體或者說物化標志，則表現爲文字、青銅器、城市、宗教這四大類。①換言之，文字、青銅器、城市和宗教，這是文明成熟的四項標準。

甲骨文已經被公認爲是中國已發現的古代文字中時代最早、體系較爲完整的文字。它主要發現於黃河流域的殷墟。殷商王室將文字刻寫於龜甲獸骨上，用它們來占卜記事。這些文字所記載的內容極爲豐富，涉及商代社會生活的政治、軍事、文化、社會習俗等內容，同時也包含了大量的天文、歷法、醫藥等信息。但是近年以來，學者們認爲三星堆出土的一些器物上的符號，也是「是抽象化、線條化的表意文字」。②這說明長江流域出現文字的時間至少不會晚於黃河流域。

青銅器主要指用銅錫合金制作的金屬器物。青銅器中，除了銅以外，最主要的成分就是錫。錫是區別青銅和紅銅的重要依據。錫礦的產地主要分布於雲南、廣西、廣東、湖南和江西，也就是長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區。在黃河流域，祇有內蒙古地區有少量錫礦。北方地區制作青銅器所需要的錫，絕大部分都來自長江流域。

在古文獻中，「城」和「市」是兩個概念。「城」的出現

早於「市」。「城」是指有防御性圍牆的地方，《墨子·七患》記載：「城者，所以自守也。」³「市」是商品交換之所，《周易·系辭》稱道：「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⁴城市最初的形態是村落。在目前的考古發掘中，最早的且形態完整的村落和城市，都存在於長江流域。

宗教是人類社會發展到一定程度時所產生的一種文化現象，其主要特點為：相信現實世界之外存在着超自然的神秘力量或實體，該神秘力量或者實體統攝萬物，擁有絕對權威，主宰自然進化，決定人世命運。一個現代意義上的宗教包括三個層面，其一為宗教的思想觀念及感情體驗（教義），其二為宗教的崇拜行為及禮儀規範（教儀），其三為宗教的教職制度及社會組織（教團）。

長江流域的先民，很早就開始了原始的宗教崇拜。林河的《中國巫讎史》一書，詳細地總結了人類的早期長江文明的各項輝煌成果，其中涉及宗教文化方面的文明成果有很多，如：以玉蟾岩遺址的「搓草紋」陶器為標志的世界上最早的植物靈崇拜；以彭頭山遺址陶器上的陰陽縷孔為標志的世界上最早的陰陽觀念；以彭頭山遺址陶器上的火靈出入孔道為標志的世界上最早的火靈崇拜；以彭頭山遺址的日月紋陶器為標志的世界上最早的日月崇拜；以高廟山遺址的人形石與鳥形石為標志的世界上最早的神靈崇拜；以高廟陶紋上的火鳳凰圖案為標志的世界上最早的鳳凰崇拜……⁵

這些早期的神靈崇拜，對長江流域宗教文化的影響至為深遠。中國本土產生的最大的宗教道教，就起源於長江流域。而佛教傳入中國的一條重要路綫，也在長江地區。通過對長江流域一些出土佛像的精細考證，我們發現，「就佛的形態姿式、手印、頭光、服飾式樣而言，已具印度佛像的儀軌，且頗為規範。其通肩式大衣，右手作施無畏印，則完全吻合印度西北之犍陀羅早

期佛像的特徵。國內學界一般也都認定這些佛像是我國佛教造像初始期的遺物，因而彌足珍貴。」⁶長江流域佛教造像的歷史定位，可以通過一組數據加以體現：北方最早的紀年佛像是後趙建武四年（338）金銅坐像，敦煌莫高窟開鑿於前秦建元二年（336），炳靈寺第169窟於西秦建弘元年（420）開始營建。而長江流域發現了延光四年（125）造像，至少領先北方兩百年之久。⁷根據這些

¹ 安志敏：《試論文明的起源》，《考古》，1987年第2期，第20-26頁。安志敏提出：「大抵以城市、文字、金屬器和禮儀性建築等要素的出現作為文明的具體標志。」關於文明的標準，最早於1958年由美國學者克拉克洪在芝加哥大學東方研究所召開的一次研討會上提出。1968年，英國學者格林·丹尼爾寫成《最初的文明》一書，把文明標準普及到全世界。克拉克洪和格林·丹尼爾認為文明有三條標準：容納5000人口以上的城市、文字、複雜的禮儀建築。國內學者在此基礎上加上了一條標準：金屬器的使用。

² 段渝：《巴蜀古文字的兩系及其起源》，《考古與文物》，1993年第一期。

³ 吳毓江撰，孫啓治點校：《墨子校注》，中華書局，1993年，第57頁。

⁴ 高亨：《周易大傳今注》，齊魯書社，1979年，第561頁。

⁵ 林河：《中國巫讎史》，花城出版社，2001年。

⁶ 胡彬彬：《長江中上游地區的造像與佛教初始輸入的別徑》，《湖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7年第5期。

⁷ 胡彬彬：《論長江流域早期佛教造像的古印度影響》，《湖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9期，第117-122頁。

考古成果證明，佛教在長江流域的傳播要早於黃河流域。

以上的四個關於文明的標準——文字、青銅器、城市、宗教，都能在長江流域找到早期的實物遺存。可見長江對孕育中華文明的貢獻非常大。

目前的學術界，對中國古代文明的四個方面的研究，主要依賴於出土文物，它們普遍都是近幾十年以來文物考古的結果。然而，對流傳於民間村落中的那些實物遺存與文化和文明的關係的研究成果并不是太多。事實上，村落是由古代先民在農耕文明進程中，在族群部落的基礎模式上，進而因「聚族而居」的生產生活所需而建造的，具有相當規模、相對穩定的基本社會單元。村落與村落文化的內涵雖不盡相同，但關聯緊密。「文化」是個舶來詞，源自拉丁文「*cultura*」。這個詞的原始詞意具有耕種、居住、敬神等多重意義。由此可知，村落和文化的關係是非常緊密的，而且都是農耕文明的產物。村落是基礎，文化是內涵。同時，村落與村落原住民又是文化載體，文化又因載體不斷傳承和衍生。因而，我們現在將眼光轉向民間村落，來探討那些承載文明及文化成果的實物遺存，就顯得尤為必要。

對於文明的四個標準，我們單獨提出對宗教進行研究。這是因為，有關古代文字、青銅器及古代城市的研究，已經有大量成果問世。對古代宗教的研究，雖然也有汗牛充棟的著作，但是多表現為對宗教的形成及其宗教義理的探討。對於宗教的另一個方面的實物遺存，即宗教藝術的研究，則大都停留在唐宋之前的佛教造像及壁畫的研究上。對於宋代以後的宗教藝術，尤其是存在於長江流域村落中的宗教遺存的研究，諸如水陸畫、道教造像及造像記，則幾乎處於缺失的狀態。作為人類文明的四個標準之一的宗教，其遺存於村落之中的重要物證及其所反映的藝術學、民

俗學信息，沒有得到很好的重視和研究。

事實上，在明清時期的民間信仰中，以道教、佛教為主的長江流域宗教，已經和民俗文化融為一體。道教本來就興起於民間，包含了上古時期的鬼神崇拜、巫史文化、民俗傳統、方技術數、道教思想等內容；而由印度傳入的佛教，在後來的本土化、世俗化、民間化過程中，也越來越成為民眾生活中的一部分。即使在科學發展的今天，大量的民眾在遇到升學、疾病等生活中的重大事情，仍然有去寺廟燒香、抽籤的風氣。在民間，宗教成為民俗文化的一部分。而大量的傳播宗教教義的雕塑、繪畫、建築等藝術形式，則成為民俗藝術的一部分。越是深入研究長江流域明清以來的宗教藝術，就越是能深刻地感受到這一點。長江流域村落中的這些大量宗教與民俗相結合的藝術遺存，正是對出土宗教文物及摩崖造像等一系列宗教藝術的補充。村落文物與地下出土文物，共同組成了長江流域包含了民俗文化因素的宗教藝術。

基於此，我們特意編撰了這一套「長江流域民俗文化與藝術遺存」叢書。我們的研究對象，主要為明清時期的實物，而且祇集中於民俗文化與藝術中與宗教相關的一部分，即與道教、佛教相關的藝術，包括長江流域道教造像、長江流域道教造像記、長江流域佛教造像、長江流域佛教造像記、長江流域宗教器物、長江流域宗教建築、長江流域水陸畫和長江流域寫經寶卷，共八卷。

一、《道風遺韻》，主要涉及長江流域道教造像。道教造像是指造於廟堂、石窟等供道教信徒奉祀的神像。長江流域開鑿的道教大型石窟造像，遠遠超過了黃河流域。這是目前道教造像的主要研究對象。但是在本書中，對此祇是進行了文字性的整理，而將主

要的視角放在小型的木雕或者泥塑造像的研究上。這些道教造像形態較小，材質普通，但是無不寄托着民眾對生活的美好祝願。

二、《祈福禳災》，主要涉及長江流域道教造像記。造像記，有時候又被稱為「造像願文」。長江流域道教造像記以紙質或者絲織品為載體，封存於造像的體內。撰寫的內容主要包括了以下六個方面：造像者籍貫和居住地址、造像者身份、造像對象、發願內容與造像原因、造像或者開光時間、造像工匠或者造像記書寫者的姓名。它們與黃河流域的敦煌及關中地區的造像記相比，格式上有了很大的不同。由於敦煌及關中地區的造像記以宋以前居多，長江流域發現的造像記以明清時期為主，所以我們也將黃河流域的造像記視為宋以前的風格，而將長江流域的造像記視為明清風格。黃河流域造像記與長江流域造像記之間有一條明顯的由簡至繁、由粗漸精的發展脈絡。不僅道教造像記如此，佛教造像記也是如此。除了像尊名號的不同之外，佛教造像記和道教造像記之間，並沒有其他明顯的形式差異。

三、《像影迴光》，主要涉及長江流域佛教造像。佛教傳入中土已經有兩千多年，佛教造像伴隨着佛教的傳播而擴展，也經歷了兩千多年的演變，成為佛教在普通民眾中流布的主要方式。佛教因而也被稱為像教。在長江流域，佛教造像石窟主要集中於上游的巴蜀地區，但是這些不是本書考察的重點。跟長江流域道教造像一樣，本書也將視野集中於小型的金屬造像或者木雕造像，時代也以明清造像為主。

四、《祈願延綿》，主要涉及長江流域佛教造像記。關於佛教造像記，清代人王昶在《金石萃編》中已有評述：「綜觀造像諸記，其祈禱之詞，上及國家，下及父子，以至來生，願望甚賒。其餘鄙俚不經，為吾儒所必斥。然其幸生畏死，傷離

亂而想太平，迫於不得已，而不暇計其妄誕者。仁人君子，閱此所當惻然念之，不應遽為斥詈也。」^①目前的造像記研究，主要歸屬於金石學的範疇，學者普遍考察其書法價值，很少關注其文字內容。長江流域中的佛教造像記跟道教造像記一樣，也以紙質或者絲織品為載體，封藏於造像體內。雖然多為下層民眾書寫，書法價值無法跟長江流域道教造像記相比，但其中所包含的大量民俗文化信息，却不可替代。本書以長江流域佛教造像記為考察對象，在學術界尚未多見。

五、《器以載道》，主要涉及長江流域宗教器物。宗教器物又稱為法器、佛具、法具或道具。廣義而言，凡是在道觀寺院內，用於祈請、修法、供養、法會等各類宗教法式的器具，皆可稱之為法器。以用途來區分，大約可分為莊嚴具、供養器、報時器、容器器、携行器及密教法器六種。宗教中的器物承載了太多的宗教文化意義，同時，也具有很強烈的民族裝飾風格。《器以載道》一書中，列舉了漢傳佛教、藏傳佛教及道教三大宗教的法器。

六、《法門妙築》，主要涉及長江流域宗教建築。流傳於華夏大地的本土宗教建築，以寺、廟、祠、觀、庵等為主，它們如同一個個容器，以其巨大的感召力，將進入其間的民眾置入其特有氣氛的控制之中，使其靈魂找到一種皈依感。宗教建築經過

① 王昶：《金石萃編》，新文豐出版公司，1997年，第671頁。

了數千年的發展和演變，在宗教教理教規的浸染熏陶中，與各個地區各個民族建築相結合，形成了一定程式的建築形式。相對其他藝術形式而言，宗教建築的地域性最無可爭議。該書的作者經過長時間的實地考察，拍攝了大量圖片，才彙成此書。其中的艱辛，難以爲外人所知。

七、《丹青教化》，主要涉及長江流域水陸畫。水陸法會是佛教寺院爲超度亡靈、普濟水陸一切鬼神而舉行的一種重要佛事，自金代至元、明、清時期盛行，至今不衰。它是「三教合一」大背景下產生與發展的民俗現象。水陸畫就是在這種水陸法會上所供奉的宗教人物畫，內容豐富多彩，具有濃厚的民俗性特徵，表現出了歷代民間繪畫事業的發展和特色。目前的水陸畫研究對象，都集中於黃河流域地區；對長江流域水陸畫的研究，才剛剛起步。

八、《經卷遺存》，主要涉及長江流域寫經寶卷。大乘佛教特別強調受持、讀誦及書寫經典的功德。《佛國記》中記載：「法顯住此二年，寫經及畫像。」^①佛教認爲寫經是一種修行，抄寫之前需要發願、盥洗理衣、沐手敬香。每抄寫一段就要停下來拜，虔誠之至。抄寫完成後念一段咒語，而後才將其供奉起來。而後，民間道教也有寫經的習俗。寶卷是由唐代寺院中的『俗講』演變而來的一種說唱文學形式。內容有佛經故事、勸世文、神道故事和民間故事，其基本傾向都是宣傳因果報因和修度世，具有濃厚的宗教色彩。長江流域的寫經及寶卷，伴隨着佛教和道教的傳播，留下了大量的遺存，成爲我們研究宗教在民間傳播的珍貴資料。

值得強調的是，我們研究民俗文化和民俗藝術，應該離開書齋，進入田野進行考察。因此，湖南大學中國村落文化研究中

心幾十年如一日，不斷地收集與之相關的文獻資料及實物遺存。本叢書所收錄的所有水陸畫、道教造像記和佛教造像記的實物資料，全部都來自湖南大學中國村落文化研究中心；部分寫經寶卷、宗教器物、佛教造像和道教造像，也都得益於這一龐大收藏體系。唯一依賴於圖片資料的，祇有《法門妙築》一書。但是這本書的所有圖片，也都由湖南大學中國村落文化研究中心組織課題組進行實地拍攝，爲第一手資料。

因爲我們是首次對這一課題進行系統考察，因此在很多方面都尚未進行深入研究，而僅停留於資料的整理歸類。叢書的不足，顯而易見。但資料的收集和整理，是每一項課題進行深入研究的基礎和前提，缺乏這一過程，所有的研究都是空中樓閣。我們整理出版這些資料，正可爲將來更進一步的研究提供重要支撐。

對長江流域文明中的民俗文化與藝術的研究而言，本叢書的出版可謂微不足道，但對該課題的研究而言，總歸是聊勝於無。希望本套叢書的出版能够拋磚引玉，喚起更多的學者加入到『長江流域文明』這一宏大課題的研究中來。

2013年5月

① 章巽：《法顯傳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47頁。

上編 道教造像綜論

001

第一章 長江流域的自然與文化

002

一 自然與文化背景

002

二 早期的神仙思想

005

第二章 長江流域道教的發展歷程

011

一 漢魏兩晉南北朝時期

012

二 唐宋時期

014

三 明清時期

019

第三章 長江流域各地區道教石窟造像

023

一 四川地區

026

二 重慶地區

035

三 雲南地區

038

四 湖北地區

038

五 湖南地區

039

六 浙江地區

039

七 福建地區

040

第四章 長江流域小型道教神靈造像

040

一 文昌梓潼帝君造像

043

二 關聖帝君、關平、周倉造像

045

三 真武大帝造像

048

四 土地神造像

049

五 雷神及雷震子造像

051

六 藥王造像

053

七 財神和趙公明造像

055

八 鍾馗造像

057

九 竈王爺造像

059

十 張五郎造像

060

十一 楊泗將軍造像

062

十二 三官大帝造像

064

十三 南嶽帝君造像

065

十四 法師造像和祖先造像

066

下編 圖版與說明

069

目錄

上編
道教造像綜論



第一章 長江流域的自然與文化

一 自然與文化背景

世界上的任何一種文明都離不開水的滋潤。除了少部分文明與海洋有關之外（如古希臘文明），絕大多數文明都與某一條河流的名字緊密聯係在一起，如埃及文明與尼羅河，印度文明與恆河，美索不達米亞文明與幼發拉底河和底格裏斯河。而古老的中國文明則與黃河和長江聯係在一起。按照一些學者的看法，文明與文化的區別並不明顯；而另有一些學者則認為文明是文化的高級階段。不論怎麼說，文化的產生是與河流的哺育有關的。通過一些數據整理，我們發現，道教的產生與壯大，與長江這條亞洲最大的河流密切相關。

長江是亞洲第一大河，其流域面積、長度、水量都為亞洲第一。與黃河幹流只有一個名稱不同，長江幹流的每一段皆有不同的稱呼。源頭至當曲口稱沱沱河，當曲口至青海省玉樹縣境的巴塘河口稱通天河，巴塘河口至四川省宜賓岷江口稱金沙江，宜賓

岷江口至湖北省宜昌間稱川江（奉節至宜昌間的三峽河段又稱為峽江），湖北省枝城至湖南省城陵磯間稱荊江，江蘇省揚州、鎮江以下又稱揚子江。

長江除了幹流以外，還有眾多的支流。其中最重要的有雅礱江、岷江、嘉陵江、沱江、烏江、湘江、漢江、贛江、青弋江、黃浦江等，其中漢江最長。幹流以北有雅礱江、岷江、嘉陵江和漢江；幹流以南有烏江、湘江、沅江、贛江和黃浦江。長江起源於青海省，流經西藏、四川、雲南、重慶、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蘇等省市，在上海注入東海。其支流域還包括甘肅、貴州、陝西、廣西、河南、浙江、廣東等省的部分地區。

遼闊的長江流域，自古以來是中國最重要的農業經濟區。這裏地形多種多樣，有高山，有丘陵，亦有平原和湖泊。流域內有2.5億畝肥沃的耕地，占全國總耕地面積的四分之一。糧食產量約占全國總產量的30%，棉花產量占全國產量的三分之一。其中，長江流經的四川盆地被稱為「天府之國」，兩湖地區被稱為「魚米之鄉」，太湖地區被稱為「人間天堂」。

早在舊石器時期，長江一帶就有許多古人類在活動，如雲南的「元謀人」、「麗江人」，四川的「資陽人」，湖北的「長陽人」等，考古學家陸續在這裏發掘了大量與之相關的化石和石器。20世紀70年代發現的江西清江美城和湖北黃陂盤龍城兩處商代遺址，證實了這裏至少在3000年以前已經存在著和黃河流域的中原地區基本相同的文化。在距今4000至6000年間，長江中游地區的原始人已經過著以稻作農業為主、漁獵為輔的定居生活，創造出較高水準的原始社會文化。在長江下游地區，同樣有許多文

化遺址，如6000年前的馬家浜文化、5000年前的崧澤文化、4000年前的良渚文化等。

長江以其獨特的自然地理環境，孕育了獨特的文化。長江流域文化是世世代代居住在這裏的人們，以勤勞智慧的汗水澆灌出的美麗之花。按照文化學家的分類，長江流域的文化大致可以分為十個區域：巴蜀文化區、滇文化區、黔文化區、荊楚文化區、贛文化區、吳越文化區、江淮文化區、閩文化區、嶺南文化區和桂文化區。長江文化中，以巴蜀文化、荊楚文化、吳越文化為主體，這三種文化在中華文化中始終佔據領先地位。同時，長江文化也包含了滇文化、黔文化、贛文化、閩文化、江淮文化、嶺南文化、桂文化等亞文化。主體文化和亞文化相結合，從而構成了長江文化龐大的體系。

（一）巴蜀文化

巴蜀文化區地跨青藏高原東緣及四川盆地，與陝西、甘肅、青海、西藏、雲南、貴州、湖北、湖南等省區接壤，自古便稱「天府之國」。但巴蜀地區四周被大山阻隔，十分閉塞。一方面，這種地理環境，有利於社會的穩定和當地文化的獨立發展；另一方面，由於地處內陸盆地，難以與周圍文化進行交流。從歷史上看，每次中原內亂，巴蜀地區都作為一個避難之所而存在，由此給它帶來了大量的外來文化資訊。巴蜀文化始終是長江文化中的主體文化，在長江文化中佔有重要的地位。自古以來，巴蜀文化一直保持著高度發展的狀態；到了兩宋時期，人才輩出，文運極盛，達到了歷史最高峰，與當時號稱文化極盛的江南地區相比毫不遜色。

（二）滇文化

滇文化區的西部、南部與東南亞的緬甸、老撾、越南三國交界，東部、北部鄰廣西、貴州、四川、西藏等省區，地形地貌錯綜複雜，是我國居住民族最多的地區。公元前1500年左右，雲南劍門地區已走近文明社會的大門。晉寧、江川、安寧、楚雄、祥雲、大理、永勝等地相繼發現的大批青銅器，表明雲南古代存在一段光輝燦爛的青銅文化。從楚頃襄王時的莊躡入滇開發此地，到唐宋時期雲南的「哀牢夷」和「白蠻」等民族創造了南詔文化、大理文化，經過兩千多年的積累，滇文化在明清時期達到鼎盛。

（三）黔文化

黔文化主要位於今天的貴州省，地貌複雜多樣，西部與雲南高原相接，合稱雲貴高原，北面與四川盆地相連，東部與湖南丘陵接壤，南部以廣西盆地為界。貴州在古代被蔑稱為「蠻貊之邦」。春秋戰國時期，在巴蜀、楚、吳越及中原文化的影響下，產生了獨特的黔文化。但是此後的一千多年裏，黔文化一直沒有起色。直到明代王陽明被貶貴州之後在此講學，才有所改觀。

（四）荊楚文化

荊楚文化區地處長江中游，以洞庭湖、湘江為中心，大致包括今天的湖北、湖南兩省。春秋戰國之際，兩湖地區的文化達到鼎盛。哲學行於前，文學殿於後，從老子經莊子到屈子，古老的東方智慧之花在此綻放。但是從秦漢到隋唐，荊楚文化一蹶不振。直到宋代，嶽麓書院創立，周敦頤於濂溪書堂講學授徒，開啟理學先聲，才打破局面。但是在整體上跟當時的四川和江浙一帶的文化相比，仍然有些距離。明清時期，兩湖地區經濟迅速發

展，為近代兩湖地區人才呈井噴式出現打下了良好基礎。

（五）贛文化

贛文化區位於長江中下游以南，鄰浙江、安徽、湖北、湖南、廣東、福建等省。集中在今日江西省境內的鄱陽湖和贛江流域一帶。遠在三千多年以前，贛江—鄱陽湖流域就已有著高度發達的青銅文明。春秋戰國時期，贛文化受到吳越文化和荊楚文化左右夾擊的影響，迅速發展。唐代是贛文化大發展的時期，整個江西共產生進士65名。宋明時期，贛文化達到鼎盛期，人才全方位出現，在政治、軍事、經濟、教育、科技、藝術、哲學諸領域，均有一批獨領風騷的卓著人物，相繼產生了歐陽修、王安石、黃庭堅、楊萬裏、李覲、朱熹、樂史、劉恕、徐夢莘、洪適、馬端臨、陸九淵、文天祥、吳澄、虞集、揭傒斯、宋應星、湯顯祖等傑出代表。

（六）吳越文化

吳越文化區以太湖流域為中心，其範圍大致包括今日的蘇南、皖南和浙江省。東臨大海，西臨彭蠡，與荊楚文化區、贛文化區接壤，北與江淮文化區隔長江相望，南鄰閩文化區。進入夏商時代，吳文化和越文化相互融合，漸趨一致。秦漢時期，吳越文化先後融入荊楚文化和中原文化之中，其特徵開始逐漸淡化。魏晉南北朝時期，吳越文化的發展水準已達到或超過了同時期的中原文化。隋唐時期，隨著大運河的開通和中國經濟重心的南移，唐中葉以後吳越文化區成為全國最重要的文化區。元明清時期，是吳越文化的鼎盛期，文采風流，已經遠遠超過同時期的其他文化，並且一直將領先地位保持到近現代。

（七）江淮文化

江淮文化區以巢湖為中心，其範圍大致包括今天長江以北的江蘇、安徽兩省。北與黃河文化的齊魯文化區、中原文化區接壤，南與荊楚文化區、吳越文化區隔長江相望。它處在長江文化與黃河文化交流的過渡地帶，是連接中國南北文化的走廊與橋梁。夏商時期，帶有濃厚中原文化特徵的徐淮夷文化，曾給南方的荊楚文化、吳越文化以深遠的影響。春秋戰國時期以後，徐淮夷文化與荊楚文化、吳越文化融合，其文化風貌已趨於一致。到戰國末年，徐淮夷文化已經完全融入荊楚文化之中。秦漢時期，淮南王劉安在壽陽招致賓客，著書立說，導致當時的江淮文化的發展在吳越文化之上。魏晉時期，江淮間豪族士人大規模南遷，江淮文化迅速衰落，這種狀態持續到南北朝時期。隋唐時期，江淮地區的經濟和文化有所恢復，但其總體水準已遠遠落後於同時期的吳越地區。明清時期，江淮文化已經融入吳越文化之中。

（八）閩文化

閩文化區東與臺灣文化區隔海相望，北、西、南分別與吳越文化區、贛文化區、嶺南文化區相接壤。它是長江亞文化區。西周時期，福建地區的文化受到吳越文化、荊楚文化的影響。西周以後，形成了閩江下游的閩越文化。秦漢時期，閩文化歸入漢文化圈。三國時期，孫吳政權在福建境內首置封建郡縣，長江文化在福建的主導地位得到確立。兩晉南北朝時期及唐朝末年，中原及江淮地區的大批士大夫遷移至福建，給閩文化注入了新鮮血液。兩宋時期，閩文化已處於全國先進行列。程顥送弟子福建人楊時回去時說：『吾道南矣。』表明中原文化已經融入閩文化。

與此同時，閩文化與域外文化開始交流。

（九）嶺南文化

嶺南文化區瀕臨太平洋，其範圍包括今天的廣東省和海南省。由於它地處五嶺之內，在很長一段時期內，都處於相對孤立、閉塞和落後的狀態，很難從鄰近文化區中獲得先進的文化因素，並與其進行文化交流。然而，由於它瀕臨海洋，容易受到海外文化的強烈衝擊和影響，從而產生一種開放性、相容性及善變性的文化特徵。春秋戰國時期，嶺南的青銅器文化和當時的吳越文化、荊楚文化相互融合，得到了初步發展。秦始皇開鑿靈渠，使得長江文化、中原文化進入嶺南的途徑更為暢通。唐代，以六祖慧能為代表的禪宗文化領先於全國。唐宋時期，嶺南文化與閩文化一道，成為長江文化與域外文化交流的一個重要據點。近代是嶺南文化的盛期，洪秀全、洪仁玕、康有為、梁啟超、孫中山、詹天佑、鄒伯奇、黃遵憲、吳趸人、容闓、鄭觀應、鄧世昌等人才紛紛躍上中國歷史的大舞臺。

（十）桂文化

桂文化區地處我國南部邊疆，南臨北部灣，西南與越南交界，東、北、西三面與廣東、湖南、貴州、雲南等省接壤。長江支流延伸到廣西境內，並通過靈渠進一步溝通了與廣西地區的聯係。它雖在地理上被劃歸為嶺南，但在文化上有其獨特性。該地出土的新石器時期的陶器、石器跟同時期的長江文化有類似之處。春秋戰國時期，駱越人和西甌人在這裏創造出了銅鼓文化。但是此後，桂文化一直處於低迷狀態。

長江流域的道教文化，受到了以上各種類型文化的影響，

在道教造像方面，更是受到了長江流域各種類型的文化的浸染與薰陶。在以往的研究中，學者們總是強調道教造像來源於對佛教造像的模仿。從造像的佈局與程式來看，確實如此，但是我們往往忽視了道教造像中本土文化的隱含因素。通過對道教造像的一些圖式分析，我們可以發現，它的根源在古老的長江流域文化中就已經打下了基礎，尤其是長江流域一帶所盛行的巫儺文化，以及在此基礎上產生的荊楚文化，對於道教造像的影響就更為明顯了。如果不是如此，我們就無法解釋，為什麼道教首先產生於長江流域，並且幾千年來一直以長江流域為中心進行發展；也無法解釋，為什麼最早的道教存在於長江流域，而且後來的道教石窟造像大量都存在於長江流域。

二 早期的神仙思想

我們承認，道教造像受到佛教的影響。從唐代中期開始，道教出現了上下兩層的信仰群體。上層以士大夫為主，主要關心學術上的精神性內涵；下層以普通民眾為基，注重道教的世俗功用。唐釋法琳《辨正論》引王淳《三教論》所云：「近世道士，取活無方，欲人歸信，乃學佛家製作形像。假號天尊，及左右二真人。」不過，這就道教造像的規範性而言。事實上，道教造像一直植根於長江流域原始的巫儺信仰，並且一直沒有拋棄「巫」的成分。如果要溯源道教造像中的一些符號或者神像的來源，則道教造像不但與佛教造像沒有絲毫關係，而且在年代上要遠遠早於佛教造像。

在春秋戰國時期，長江流域中下游地區，基本上都是楚國的

領地。尤其到了戰國時期，楚國吞併沿海的吳越，將長江中下游的幹流全部收入版圖當中，已經達到空前的規模。因此就長江中下游地區來說，楚國的文化一直影響深遠。漢代的文化，依然是楚文化的延續。南方的大國楚國，向來以「信巫鬼，重淫祀」（《漢書·地理志》）著稱於世。《尚書·伊訓》曰：「敢有恆舞於宮，酣歌於室，時謂巫風。」疏云：「巫以歌舞事神，故歌舞為巫覡之風俗也。」又《周禮·大司樂》：「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樂八變，則地祇皆出，可得而禮矣。」「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神靈降臨之後，就可以與之交通了。鄭玄注《周禮·男巫》云：「與神通言，當東則東，當西則西，可近則近，可遠則遠，無常數。」在中國傳統文化之中，「巫」和「覡」是溝通人神關係的使者。《說文解字·巫部》解釋「巫」則為：「祝也。女能事無形，以舞降神者也。」解釋「覡」，則曰：「從巫從見。」南唐徐鍇釋「見」旁曰：「能見神也。」《國語·楚語下》：「在男曰覡，在女曰巫。」覡和巫，一為男一為女，只有性別上的差異，而他們的職責卻是一樣的。

《呂氏春秋·侈樂》也說：「楚之衰也，作為巫音。」《莊子·逍遙遊》則更為詳細地記載：「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禦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將楚人所想像的神仙生活，描繪得神奇而生動。

《隋書·地理志》記載了楚地的風俗：「大抵荊州率敬鬼，尤重祠祀之事，昔屈原為制《九歌》，蓋由此也。」《楚國大詩人屈原在詩歌裏面描繪了大量楚人祭祀神巫的事實，除了《離

騷》、《天問》以外，《九歌》是祭祀神巫的典型作品，這組詩共十一篇：《東皇太一》、《雲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東君》、《河伯》、《山鬼》、《國殤》、《禮魂》。王逸《楚辭章句》說：「《九歌》者，屈原所為作也。昔楚國南郢之邑，沅、湘之間，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樂鼓舞以樂諸神。屈原放逐，竄伏其域，懷憂苦毒，愁思沸鬱。出見俗人祭祀之禮，歌舞之樂，其詞鄙陋，因作《九歌》之曲。」明代的汪瑗在《楚辭集解》中說：「前十篇，祭神之時，歌以侑觴；而每篇歌後，當續以此歌也。」王夫之的《楚辭通釋》延續了此說，指出，《禮魂》是「送神之曲」，「乃前十祀之所通用」，這就明確地認為，前十章所祭祀的其實是十種不同的神靈。迎請神仙降臨，只有巫和覡能夠做到。他們入地通天，使得神靈附體，帶領民眾用歌舞、祭祀的方式來取悅神靈。

早在夏商周時期，古代先民就對死亡懷著憂慮，希望能夠長生不死。《山海經》中屢次出現對於「不死民」、「不死國」、「不死樹」、「不死藥」、「不死人」、「不死山」、「不死草」等的描寫。這種對於不死的嚮往，就是最初的神仙思想產生的根源。人通過某種神奇的修煉，就可以達到不死的目的，而這種沒有死亡的神仙，就具有了特殊的形象。如《海外西經》所描述的：「大樂之野，夏后啟於此儻九代；乘兩龍，雲蓋三層。左手操翳，右手操環，佩玉璫。」《海外東經》則描繪了一個叫「句芒」的神仙是「鳥身人面，乘兩龍」的形象。

這種形象，到了屈原的筆下，被塑造得更為詳細，如《離

騷》、《九歌》、《遠遊》中的各種形象。不過，這種神仙境界、神仙觀念尚處在彼世，普通人無法企及。或者說，這些想像出來的神仙世界，與現實生活無法產生直接的關係。儘管在文學作品中出現了大量的神仙，但是始終無法與正常人進行對話溝通。所以，與其嚮往與神仙世界的接觸，不如親身實踐，讓自已成爲神仙中的一員。一些方士將通往此間的途徑分爲兩種，一種是進入山林，經過辛苦地修煉來完成，這是後世信仰道教的主要群體，主要由下層民眾構成；另一種是服用「神仙」的不死藥，直接得道升天，這類群體以帝王統治者爲主，如《史記·封禪書》記載：「自（齊）威、（齊）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傳在渤海中，去人不遠，患且至，則船風引而去。蓋嘗有至者，諸仙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其物禽獸盡白，而黃金銀爲宮闕。未至，望之如雲，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臨之，風輒引去，終莫能至云。世主莫不甘心焉。」《韓非子·外儲說左上》云：「客有教燕王爲不死之道者。」《戰國策·楚策》云：「有獻不死之藥於荊王者。」

戰國時期，齊國的學者鄒衍將「陰陽說」和「五行說」相互融合，創立了「陰陽五行學說」。這種帶有神秘色彩的思想，對神仙思想的產生，帶來了巨大的影響。燕國和齊國一帶的方士，在「陰陽五行學」和其他的方術思想的浸染下，宣揚長生不老之道，吸引統治者，以博取功名利祿。在方士們的鼓吹和傳播之下，能使人長生久視的「不老之藥」、「不老之道」，引起了很多人的興趣。到了後來，方士們又直接鼓吹神仙可見、神仙可成，進一步迷惑統治者，其中以秦始皇、漢武帝爲代表，深

信方士關於神仙之言論。在帝王們的推崇之下，神仙思想在秦漢時代大爲興盛。因爲秦王朝延續時間太短，所以只是埋下了神仙思想的種子。到了漢代，這種思想觀念突然像花朵般綻放，爲後世留下了光輝燦爛的神仙文化與藝術。具體來說，就是漢人文章尤其是辭賦中對神仙世界鋪陳大氣的描寫，以及漆器、壁畫上的神秘瑰麗的描繪。漢代人對神仙生活的描繪，反映出當時人們求仙、尋仙的熱切希望，以及神仙方術氛圍的濃厚。根據一些學者統計，漢賦中所描繪的神仙大概有五十多位，如揚雄《甘泉賦》：「喻清雲之流霞兮，飲若木之露英……想西王母欣然而上壽兮，屏玉女而卻宓妃。玉女無所眺其清廬兮，宓妃曾不得施其峨眉。」按照時間順序，這些神仙可大致分爲兩類。

（一）秦漢之前在典籍如《山海經》、《莊子》、《楚辭》中出現過的神仙

這類神仙大致有作爲仙界最高統治者的西王母及東王公、作爲水神的馮夷與河伯、類似於後世民間所流傳的南極仙翁那樣的長壽仙人彭祖等。

西王母與東王公：西王母最早見於《山海經》。如《海內北經》記載：「西王母，梯几而戴勝，其南面有三青鳥，爲西王母取食。」《西次三經》記載：西王母「其狀如人，豹尾虎齒而善嘯，蓬髮戴勝。」這個描述表明，西王母最初帶有獸的特徵。東漢時期，一些學者重新杜撰出一個東王公，與西王母配成一對。如東漢初年郭憲的《洞冥記》中稱：「昔王母乘靈輦，以適東王公，稅此馬於芝田，東王公怒，棄此馬於清津天岸。」虛構出西王母與東王公約會時的場景來。北宋年間成書的《太平廣記》卷